

论容闳的报国心

钟叔河先生在为容闳的《西学东渐记》再版时，写了一篇《为使西学东渐而奋斗的一生——容闳和他的〈西学东渐记〉》的文章。钟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了这样意味深长的话：

在美国康州哈德福特城西带山公墓（Cedar Hill Cemetery）的绿阴深处，一块方座圆顶、正面刻有一个中文“容”字图案的墓碑后面，长眠着一个中国人。他虽然死葬在异邦绝域，他的心却一直眷恋着祖国，眷恋着祖国的土地和人民。

……

正如容氏在他这部惟一的回忆录《西学东渐记》中所叙述的，他从赴美留学，到学成归国，到向太平天国提政治建议，到筹办江南制造局，到组织中国留学生出洋，到参加维新变法运动被清政府通缉，到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整整一生是爱国的一生，是为了寻找中国现代化（用这本书的名字来说就叫“西学东渐”）的道路，不断地“上下而求索”的一生。^①

容闳一生没有多少轰轰烈烈的伟大举动，他也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但他朴素而执着，是一个具有很强历史责任感的爱国者。他的确是“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的中国学者的典型。他的一生是第一代留学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使中国能够独立、民主和富强而努力奋斗的一生，他留给后人很多启迪，值得后人永远怀念。

容闳在《西学东渐记》“自序”中说：

一向被当作西方文明表征的西方教育，如果不能使一个东方人变化其内在的气质，使他在面对感情和举止截然不同的人时，觉得自己倒像来自另一

^① 钟叔河：《为使西学东渐而奋斗的一生——容闳和他的〈西学东渐记〉》，参见容闳著：《西学东渐记》，徐凤石、恽铁樵原译，张叔方补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个世界似的，那不就可怪了吗？我的情况正好如此。然而，我的爱国精神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正好相反，这些都由于同情心而更加强了。因此，……我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①

容闳做得多，说得少，但他具有中国文化人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美德，尽管他在美国留学并成家立业，可是他真正做到了“我心依然是中国心”。他爱祖国，爱人民，追求西学是为了有益于中国。他作为一个自始至终热爱祖国的人，虽然最终不得不“远托异国”，直至埋骨在海角天涯，然而，因为他为了祖国和人民奋斗了一生，祖国和人民当然也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贡献。

—

1828年11月17日，容闳出生于离涉外口岸澳门不远的广东香山县南屏村。容闳的父亲是个地道的农民，然而，当容闳7岁时，他的父亲容丙炎却愿意通过熟人将儿子送到澳门洋学堂去学习。后来，容闳对当时的情况作了这样的回忆：

惟是时中国为纯粹之旧世界，仕进显达，赖八股为敲门砖，予兄方在旧塾读书，而父母独命予入西塾，此则百思不得其故。意者通商而后，所谓洋务渐趋重要，吾父母欲先着人鞭，冀儿子能出人头地，得一翻译或洋务委员之优缺乎？至于予后来所成之事业，似为时世所趋，或非予父母所及料也。^②

就这样，容闳入了澳门马礼逊预备学堂读书。父亲只是希望儿子进了洋学堂学好外文，将来谋个翻译工作，而容闳虽则聪慧伶俐，但却不太用心，起初，他对马礼逊预备学堂的严格管教不能适应，后又因家贫辍学。1841年，容闳正式进入马礼逊学堂，翌年又随学校由澳门迁至香港。在这里，他遇到了一位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的神学博士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老师。在布朗先生的资助和教授下，容闳进步很快，学习成绩名列榜首。1846年冬，布朗回国，并将容闳、黄宽、黄胜带往美国，从此改变了容闳的人生道路。他克服了社会的偏见与母亲的劝阻，勇敢地走向了世界。

1847年1月4日，容闳乘美国奥利芬洋行（The Olyphant Brothers Co.）的

^① 容闳著：《西学东渐记》，徐凤石、恽铁樵原译，张叔方补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页。

^② 容闳著：《西学东渐记》，徐凤石、恽铁樵原译，张叔方补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亨特利思”（Huntress）号商船，由广州黄埔港起航，经中国南海，过马六甲海峡，经印度洋，绕道好望角，再入大西洋，历经98天之久的航行，于1847年4月12日抵达美国纽约港。一星期后，容闳在布朗先生的安排下进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学习。孟松学校为新英格兰最有名之预备学校。校长海门（Rev Charles Hammond）“德高望重，品学兼优”，“夙好古文，兼嗜英国文艺，故胸怀超逸，气宇宽宏”^①。海门校长对容闳特加礼遇，甚望其学成归国，能有所贡献。1848年秋，容闳立志报考耶鲁大学，布朗先生和海门校长也希望容闳入耶鲁大学深造，并想为容闳申请孟松学校校董会为贫苦学生升学而设置的奖学金，但欲取此项奖学金的学生必须先具保证书，毕业后要以传教为职业。容闳没有同意同校方具结志愿书。为什么？他写道：

此在校董一方面，固对予极抱热诚。而予之对于此等条件，则不轻诺。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竞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狭，有用之身，必致无用。且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以吾国幅员若是其辽阔，人苟具真正之宗教精神，何往而不利。然中国国民信仰果何如者？在信力薄弱之人，其然诺将如春冰之遇旭日，不久消灭，谁能禁之？况志愿书一经签字，即动受拘束，将来虽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福利者，亦必形格势禁，坐视失之乎？余既有此意，以为始基宜慎，则对于校董诸人之盛意，宁抱歉衷，不得不婉辞谢之。嗣海门悉予意，深表同情。盖人类有应尽之天职，决不能以食贫故，遽变宗旨也。^②

由此可见，容闳出国留学，不是为了成为一名神职传教士，更不是为了自己的个人安逸，而是有益于中国。正由于容闳抱着有益于中国的目的而在美国深造，在1847—1857年的十年间，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的知识，“读书恒至夜半，日间亦无余晷为游戏运动”。他努力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及算术、文法、生理、心理及哲学等课程，“曾诵习多数英国之文集”。他的微积分成绩虽不甚好，但“英文论说颇优，第二第三两学期连获首奖”，“校中师生异常器重，即校外人亦以青眼相向”。^③但是，正如钟叔河先生所言：“对于一个思想敏锐而又时刻

① 容闳著：《西学东渐记》，徐凤石、恽铁樵原译，张叔方补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② 容闳著：《西学东渐记》，徐凤石、恽铁樵原译，张叔方补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0页。

③ 容闳著：《西学东渐记》，徐凤石、恽铁樵原译，张叔方补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22页。

关心着祖国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的青年来说，化学实验在玻璃仪器内显示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微积分可以启发对合理化的思考和追求，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史也足以使他痛切地感觉到专制制度的违反人性和缺乏道德基础。”由于知识的积累和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了解增多，容闳懂得，到外国留学，不能只学各种科学知识和外国的语文，那样做，“充乎其极，不过使学生成一能行之百科全书，或一具灵性之鹦鹉耳，曷足贵哉！”^①容闳所学为所用，他广泛接触美国社会，直接熏陶于西方文化，摄入西方的新知识是为了改造旧中国。所以，诚如同时代的美国友人布思所称赞的，容闳是“一个极有才干的人”，“他有强烈的爱国心”，“他除了要完成他自认为对其人民极为有利的工作外，并无任何个人野心”。^②孙中山也说容闳“才智学识，达练过人”，“先生久离乡井，祖国萦怀”。^③这些都反映容闳虽然自幼赴美留学，但他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具有身在异国心在乡邦的报国心。

二

1854年夏天，容闳在学完美国耶鲁大学规定的必修课程之后，获得了学士学位，从而成为第一个受过完整美国教育并取得了学位的中国人。像容闳这样毕业于美国一流大学，又刻苦干练、热情有为、英语很好的青年，在美国不愁找不到一份理想的工作。然而，他不图个人的安逸生活，毅然决定回国，报效祖国。他当时的心情，正如他后来所说：

予于一八五四年毕业。同班中毕业者，共九十八人。以中国人而毕业于美国第一等之大学校，实自予始。以故美国人对于予感情至佳。时校中中国学生，绝无仅有，易于令人注目。又因予尝任兄弟会藏书楼中司书之职二年，故相识之人尤多。同校前后三级中之学生，稔予者几过半。故余熟悉美国情形，而于学界中交游尤广。予在校时，名誉颇佳。于今思之，亦无甚关系。浮云过眼，不过博得一时虚荣耳。^④

这是说容闳的条件不错，他如果从个人的工作和享受去考虑，可以不回国。

^① 钟叔河著：《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7页。

^② 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范学院辛亥革命史研究室合编：《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第二辑（1984年），第29页。

^③ 孙中山：《致容闳函》，《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44页。

^④ 容闳著：《西学东渐记》，徐凤石、恽铁樵原译，张叔方补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与他有过多年交往关系的吐依曲尔牧师 (Rev. Joseph H. Twichell) 也指出: 只要容闳乐意, “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他非常想留在美国。但是他说, 这时《圣经》上有条经文, 就像上帝的声音一样在他的耳边萦绕回响。经文上说: ‘不论是谁, 如果不为自己, 特别是不为自家人作打算, 他就是否定了教义, 因而比异教徒更坏。’ 在容闳的心目中, ‘自己’、‘自家人’ 这些字眼意味着孕育他的祖国。这条经文得胜了。他象是从整个民族中被挑选出来去接受恩典似的, 他的正义感和报恩心也不会让他自私自利。所以, 虽然他无从预料什么会降临到他的头上, 他还是决心回去。”^①

《圣经》是否会有那么大的作用不可知, 但容闳惦记着他的祖国, 希望祖国有一天同美国一样兴旺发达则是真的, 恐怕是后一个原因促使容闳踏上回国之路, 报效祖国。但当他踏上中国的土地后, 很快就发现, 他对他日夜思念的祖国已经很陌生, 中国虽然没有忘记他这位海外学子, 但他似乎已不太了解中国。一方面, “中国之腐败情形, 时触于怀”, 使他每一念及, 便“辄为之怏怏不乐”; 另一方面, 他又觉得“不应存此悲观”。他说: “予既远涉重洋, 身受文明之教育, 且以辛勤刻苦, 幸遂予求学之志, 虽未能事事如愿以偿, 然律以普通教育之资格, 予固大可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矣。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 则当日夕图维, 以冀生平所学, 得以见诸实用。此种观念, 予无时不耿耿于心。”并说, 还在耶鲁大学第四学年尚未毕业时, “已预计将来应行之事, 规画大略于胸中矣。予意以为予之一身, 既受此文明之教育, 则当使后予之人, 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② 正是由于容闳胸怀祖国, 他才毅然回国, 想把所学“西方之学术, 灌输于中国”, 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

中国人走向世界、接触西方, 既有一个如何学习外国长处的问题, 又有一个怎样抵抗侵略的西方的问题。容闳当然不可能对当时的美国作科学的分析, 但他却保持了国格和人格。他致力于“西学东渐”, 然则无论在美国读书, 或在香港、上海工作, 他都坚持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 宁可辞去有伤民族尊严的工作。随着接触和认识的深入, 容闳同其他先进的中国人一样认识到, 仅仅学一点西方的“长技”, 搞一点坚船利炮, 还是不行的。“要救国, 只有维新”, 维新行不通, 就只有革命。在这方面, 容闳的一生走过的道路、他的思想和足迹, 总可

① An Address by the Rev. Joseph H. Twichell. Yung Wing.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Appendix, pp. 256 ~ 258 (1909, New York), 中译文引自张海林著: 《王韬评传》,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第390~391页。

② 容闳著: 《西学东渐记》, 徐凤石、恽铁樵原译, 张叔方补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22~23页。

以留作我们借鉴。

然而，在一个外受欺凌、内存忧患的国家里，容闳要报效祖国绝非易事。他返国后，遇到种种困难，首先是中国语言文字不通，其次难以找到适合发挥个人专长的工作。他曾任美国传教士伯驾的私人秘书，原以为可以通过伯驾接触清朝官员，实现其改革中国的计划，谁知伯驾对此不感兴趣，且每月工资只有15元，容闳干了几个月就辞职了。随后，他到了香港，在香港高等审判厅任译员，工资较高，每月可得75金。然而，当翻译毕竟不是容闳的理想职业，他想学习法律，做开业律师，但为英人排斥，只好放弃此工作。不久，他到了上海，在海关从事翻译工作，薪水倒很优厚，月薪达75两白银，但容闳看不惯外国人掌握中国海关，只干了3个月便辞职不干。在辞职书上，容闳铿锵有力地地质问上海海关税务司李泰国：“中国人为中国国家服务，奈何独不能与彼英国人享同等之权利，而终不可以为总税务司耶？”李以月薪200两白银加以挽留，但容闳以“今海关中通事及其余司一职者，几无一不受贿赂。以予独处此浊流中，决不能实行予志”^①，一走了之。可见，容闳“爱护祖国之念甚强”，他“爱护中国之忧，诚非一般人所能企及”。^② 经过几番蹉跎，容闳通过赴美办购买机器获得了清朝洋务派官员的信任，后在曾国藩、丁日昌等人的帮助下，心中蕴藏了十几年之久的教育救国计划，终于得到了清政府批准，并于1872年带领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赴美，实现了其建议派学生去美留学的计划。这是容闳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事情。

在容闳的努力下，从1872—1875年，清政府曾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③，成为中国直接派遣留学生出国向西方学习的开端。尽管容闳的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的计划由于清廷顽固派的反对，未能完成原定的15年的留学计划，中途被迫撤回。然而，容闳的努力对于中国教育的改革、新式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经过留美学习成长起来的科技人员及其他方面的人才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例如开平煤矿的著名工程师邝荣光，工程建设专家邝炳光，中国电报、电话事业的开拓者梁宝荣、程大业，近代中国铁路技术专家詹天佑，以及许多铁路建设的经理、总办、董事、工程师都是早期留美

① 容闳著：《西学东渐记》，徐凤石、恽铁樵原译，张叔方补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6页。

② 舒新城著：《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5页。

③ 1872年8月11日，经过考试遴选的第一批留学生30名启程赴美。1873年6月12日、1874年9月19日和1875年10月14日，又有三批各30名学生先后赴美。这些学生当中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10岁，大都是东南沿海一带人，以广东人最多。参见舒新城著：《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1～14页；胡光熙：《早期出洋的游学生（1872—1912）》，载台湾《传记文学》第34卷第2期；李喜所著：《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1页。

学生。有的留美学生如杨兆楠、黄季良、薛有福、邝咏钟还参加中法战争并壮烈牺牲。在甲午中日黄海大战中，陈金揆任致远舰大副，与邓世昌紧密配合，冲锋陷阵，英勇殉国，沈寿昌、黄祖莲也在战斗中光荣牺牲。还有一些留美学生活跃于外交、文化、教育界，他们默默耕耘，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巨大贡献。^① 所以，人们称颂容闳为“中国留学生之父”，是对他教育救国实践的肯定。容闳热切追求中国社会的巨变，他致力于“西学东渐”，但不局限于翻译几部英文著作，介绍一些外国知识，而是将精力集中在新一代人才的培养上，他的事业是对中国具有开创性的事业，具有开风气、创世纪的意义。正如舒新城先生所说：“无容闳，虽不一定说中国无留学生，即有也不会如斯之早，而且派遣的方式也许是另一个样子。”^② 这一分析恰当地反映了容闳在留学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三

由于清政府中顽固派的反对，容闳以通过争取清朝同意派遣留美学生，为中国培养人才，实现教育救国的愿望受阻。容闳“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③ 的理想落空，容闳的心情可想而知。留学生教育计划的夭折和美籍夫人凯洛格的去世，给容闳的打击甚大。他说：“一个使我毕生为之奋斗的教育计划被搞垮，另一个是剥夺了我只度过十年的幸福家庭。”因此，他感到心烦意乱、不知所从，他在美国蛰居下来，过着无所作为的生活。大约在1887年新年期间，容闳写下新诗一首，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

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
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
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
春色无新故，幽居亦见过。^④

这首诗表现了容闳内心处于低潮的真实情景。

^① 参见李喜所：《近代留学生对祖国的贡献》，载《人民日报》1987年6月8日；高宗鲁译注：《中国幼童留美史——现代化的初探》，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82年版，第100页。

^② 舒新城著：《近代中国留学史》，中华书局·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2页。

^③ 容闳著：《西学东渐记》，徐凤石、恽铁樵原译，张叔方补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8页。

^④ 这首诗的原件收藏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转引自顾长声著：《容闳——向西方学习的先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60页。

中年丧妻，事业受阻，人所难堪。然而，容闳毕竟是一位有坚强意志和强烈民族意识的人，他不会由于家庭的不幸和报国事业受阻而放弃自己的追求。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他即乘船归国，1895年初夏抵上海。此后，他曾向张之洞和清吏提出了改革中国的许多新主张，如聘请外国人为中国外交、财政、海军、陆军的顾问，建立国家银行，修筑铁路，等等，这些主张均由于清政府的极端腐败未被采纳。容闳说：“予救助中国之心，遂亦至此而止矣。”^① 此处所说“救助中国之心”，是指扶植清朝政府之心，也即是说，他通过为清政府效命，改革中国，但由于清廷对他冷遇，使他改变主意，寻找新的救国道路。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进入高潮，此时的容闳已是70岁高龄的老人，但他积极参与维新派的活动。西太后慈禧发动政变后，他积极设法营救康有为、梁启超出京失败而成为通缉对象，他出逃避入上海租界，后又避难于香港。由于清朝顽固派反对中国进行改革，使容闳认识到在保留清政府的条件下中国不能振兴，国家也不能富强，因此他思想中的激进因素不断增强。1900年容闳支持唐才常自立军起义。7月，唐才常等在上海召开自立国会，通过容闳起草的宣言，并选容闳为会长，具体负责外交事务。但自立军起义事泄，清政府在长江一带大捕党人。容闳于9月1日化装变名“秦西”，乘船离沪走日本。^② 容闳在国内从事振兴中国的努力也宣告结束。

1911年10月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时，容闳已是83岁高龄的老人。当这位滞留美国的中国老人听到自己曾为之努力改革的祖国发生了巨变时，他兴奋不已。1911年12月容闳中风在床，但他仍忍不住喜悦的心情给老友谢纘泰写信。他高兴地写道：

目前中华帝国发生的政治现象在历史上确是非凡而空前的。

在仅仅数月的剧变中，我们古老的中国，从中部震及四方，直至几乎所有省份都举义参与我们反对满清王朝及政府的斗争。

我真诚地希望不会发生任何事来敌对目前遍及全国的平和的情绪。如果领导者的个人野心产生并占据了他们的心，将加重混乱、无政府和流血，不可避免地一定导致外国的干涉。这将导致整个中国被瓜分。

愿所有中国的爱国者警惕这种危险，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如果健康状况允许，你将发现我很快会回国，纵然不能去同敌人战斗，

^① 容闳著：《西学东渐记》，徐凤石、恽铁樵原译，张叔方补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

^② 吴相湘：《容闳最有意义的一生》，载台湾《传记文学》第16卷第6期。

也可以提点对公众利益有益的建议。^①

信中不仅表明了容闳已看出清政府即将垮台对古老中国发生的深远影响，而且还清醒地看到野心家可能会登场争夺未来中国的领导权。他告诉爱国者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要警惕野心家和外国的干涉，同时表示，只要健康允许，他即将回国为国家和人民效力的愿望。尤其可贵的是，容闳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预感到袁世凯是个野心家，劝告革命者绝对不要相信连光绪主子都出卖了的袁世凯。他说：

一点儿也不要相信袁世凯通过他的喉舌唐绍仪对你们说的话。你们可以断定，他们全是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是个什么人？难道他在一八九八年不是背叛了他的主人光绪皇帝吗？难道要信任一个叛徒吗？他是最受外国驻京外交家赏识的人。他乘机利用满清皇帝的崩溃，披着形形色色的巧妙伪装进行抢掠，直到把卑鄙的大烟鬼庆亲王（Prince Ching）的总理职位拿到手之后，他的那条跛腿立即变好了，他能够动来动去，想要支撑住可恶的满清机器，再来接管中国，并由他来当司机，任其操纵。难道可以信任这样一个大阴谋家吗？不，必须把他和满洲人一齐撵走。^②

孙中山对容闳心仪已久。容闳与孙中山同属香山县人，但他比孙中山大38岁，算是孙中山的父辈。在1900年9月孙中山与容闳在日本长崎会见之前，他俩一直未曾见过面。经容星桥介绍，两人一见如故。容闳劝孙中山回国，南下台湾观察华南的局势，并亲自筹划惠州起义。容闳鼓励孙中山以“华盛顿、弗兰克林之志”^③为志。容闳也从长崎赴香港。1902年，洪全福、李纪堂等谋划在广州起义，拟推容闳为大总统，事泄后，未遂的大总统容闳再度逃亡到了美国。

在美国，容闳继续为革命事业奔波，不仅在华侨华人中争取支持者，还向美国人介绍孙中山。1909年，容闳邀请孙中山去美国，与荷马李和布思等一起商议制订革命计划。后来，孙中山与荷马李等密谋的美国长堤计划就是容闳一手促成的。

武昌起义胜利后，容闳写信给他的老朋友谢纘泰，请他代向孙中山“致以衷

^① 广东中山市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中译文引自邓丽兰编著：《临时大总统和他的支持者——孙中山英文藏档透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② 谢纘泰著：《中华民国革命秘史》，江煦棠、马颂明译，《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4页。

^③ 刘禹生撰：《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15页。

心的祝贺”，并希望孙中山能“当选下届大总统”。当时容闳患病在床，但他还记挂着新政府的财政问题，并让儿子容覲槐回国，为新生的共和国建设事业服务。

孙中山收到从谢纘泰转来的容闳的信后，于1912年2月写信给容闳，邀请他回国辅政。然而，4月21日，容闳逝世，结束了他爱国奋斗的一生。

毫无疑问，容闳是一个具有强烈报国心的爱国者，正如美国牧师吐依曲尔于1878年4月10日在耶鲁法律学校肯特俱乐部的演说中对容闳的评价：

从头到脚，身上每一根神经纤维都是爱国的。他热爱中国，信赖中国，确信中国会有灿烂的前程，配得上它的壮丽的山河和伟大的历史。^①

四

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中国人无论生活在哪里，也无论接受何种文化的熏陶，都依然有一颗中国心。只要有这一颗中国心，他就是民族的脊梁，就是祖国的希望。英国人罗素说过这样的话：

中国人，从上层社会到底层百姓，都有一种冷静安详的尊严，即使接受了欧洲的教育也不会毁掉。无论个人还是国家，他们都不自我肯定；他们的骄傲过于深厚，无需自我肯定。虽然也承认兵力上敌不过外国列强，但并不因此而认为先进的杀人方式是个人或国家所应重视的。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都在心底里自信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拥有最完美的文明。^②

罗素又说：

从孔子的时代以来，古埃及、巴比伦、马其顿、罗马帝国都先后灭亡，只有中国通过不断进化依然生存，虽然也受到诸如昔日的佛教、现在的科学这种外来影响，但佛教并没有使中国人变成印度人，科学也没有使中国人变成欧洲人。我曾经遇到有些中国人，他们对于西方科学的了解不亚于我们的教授，但并不因此失去平衡，也没有失去与自己人民的联系。对于西方的坏东西——兽性、不安、欺压弱者和纯物质的贪欲——他们都心如明镜，不愿

^① 容闳著：《西学东渐记》“代跋”，徐凤石、恽铁樵原译，张叔方补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② （英）罗素著：《中国问题》，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59页。

接受。而对于那些优点，尤其是科学，则照单全收。^①

罗素说得对。容闳就是如罗素所说的对于西方的科学如痴如醉、“照单全收”的人，他是致力于“西学东渐”的智者和勇者。虽然容闳反抗清政府，经历了清朝政府的迫害，逃亡到了日本和美国，但他仍然执着地热爱着他的祖国和人民。他为什么会有如此崇高的精神境界？无他，是因为他对祖国怀有“永恒热爱”，期望祖国得到迅速“改革和复兴”，像世界上所有文明古国一样，享有它应有的地位，并早日成为繁荣富强的国家，让人民过着幸福的生活。

容闳不是思想家，也不是政治家，当然更谈不上是实业家，但他一生的经历则丰富多彩。近代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甲午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自立军起义、辛亥革命等都在他的思想里留下记忆和活动的足迹。他经过商，办过教育，做过小官，办过外交，搞过企业，但从哪一方面看，他都谈不上是什么“家”。不过，他的爱国则是一贯的、始终如一的，所以用不着称为什么“家”，他也是中国伟大的忠诚的爱国者，他真心实意地爱着祖国和人民，希望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他付出的不仅是精力，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无限热爱祖国、报效祖国的力量，唯其如此，他就称得上是一位伟大和杰出的中国爱国者。我们怀念他和纪念他，也是因为他具有爱国精神和振兴中华的优秀品格，不是由于他曾是什么政治家、实践家。他一生的留学经历和报效祖国的行为给我们今人留下许多思考的空间。

(1998年)

^① (英) 罗素著：《中国问题》，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64页。